



歷史與文化叢書

台灣

新文化史

文化與權力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14

後現代史學文選 (I)

文化與權力

台灣新文化史

盧建榮 / 主編

麥田出版

歷史與文化叢書 14

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

主 編：盧建榮

責 任 編 輯：鄧立言

發 行 人：陳雨航

出 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51-7776 傳真：(02) 2351-9179

發 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100號4樓

電話：(02) 2396-5698 傳真：(02) 2397-9851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mail：service@cite.com.tw.

香 港 發 行 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字樓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 新 發 行 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印 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5號

初 版 一 刷：2001年11月27日

ISBN：957-469-849-1

售價：3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 作者簡介 ■

莊雅仲

美國杜克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後殖民和文化研究。

盧建榮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並兼任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劉獻廷》（商務：1977）、《魏晉自然思想》（聯鳴：1980）、《曹操》（聯鳴：1980）、《一位父親的叮嚀：顏氏家訓改編本》（時報：1981）、《分裂的國族認同》（麥田：1999）、《入侵台灣》（麥田：1999）等書及學術論文六十餘篇。

廖炳惠

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著有《形式與意識形態》（聯經：1990）、《里柯》（東大圖書公司：1993）、《回顧現代》（麥田：1994）、《另類現代情》（允晨：2001），另有論文數十篇。

夏春祥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現任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教授社會學、傳播社會學等課程；專長領域在文化研究、歷史社會史與傳播史。

張瑞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師大史研所兼任教授。著有《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1905-1937）》（1987）、《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1991）、《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1993）、《文化人類學新論》（譯作，許烺光原著，1979）等書，以及論文數十篇。

江政寬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現任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專長領域為歐美當代史學史。譯作計有：《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解釋過去／了解現在：歷史社會學》（合譯）、《後現代歷史學》（以上均為麥田出版），以及《馬丹·蓋赫返鄉記》（聯經：2000）等書。

張嘉驊

中國北京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研究所兒童文學博士班；專長領域為兒童文學文本的文化研究。曾任民生報兒童版編輯，並出版近二十本兒童文學創作。

祝平一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領域為明清科學史。

廖咸浩

美國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愛與解構》（聯合文學：1995），文章散見重要期刊、以及報紙和言論版。

編者序

論述的嘉年華會

盧建榮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台北史學天空遽然出現若干新語彙，其中最特殊的非論述一辭莫屬。這些專業術語頻頻曝光的背後，為一場悄無聲息的史學革命揭開序幕。

一、選文傾向的說明

本書的選文即是這場革命業績的一部分。在這九位作者中，並非清一色歷史學者，之中有一位人類學家（莊雅仲）、兩位文學批評家（廖炳惠和廖咸浩）、傳播學家（夏春祥）、以及語言學家（張嘉驊），真正出身史學科班的只有張瑞德、祝平一、江政寬、以及盧建榮等四位，在出力提供文章上不到全書的一半。這是因為以文化為主題的研究，歷史學界是後知後覺者，這也符合台灣歷史學保守的性格。抑有進者，在台灣史於歷史研

究行業中躍居顯學，甚至淒淒然有發展成握有政治正確詮釋權之際，「台灣史」學者反而在九〇年代的文化研究課題上繳了白券。上述四位史家以其專業而論，有兩位中古史家、一位明清史家、一位近代史家，都非地道的台灣史家，結果他們竟然齊步走上觀察當代台灣文化的問題上面，寧非怪事？

其次，就選文在台灣歷史縱深的分布，呈現的十七世紀兩篇，二十世紀八篇，在以上兩世紀之間三百年我竟揀選不出一篇代表作。這益發可見文化議題尚未為台灣史社群排入研究議程表。又次，這九位學者是青壯年齡層的學者，代表的是告別老世代的研究風格。

還有，從研究主題分布看，環繞在原住民（三篇）、婦女（一篇）、以及兒童（一篇）等弱勢者文化的為數最多，共得五篇；次多的是攸關權勢者文化政策，計有三篇；其他有關文化菁英對群眾動員的、史學與敘事文化關係的，則各有一篇。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一點是，敘事文化的問題在許多篇中多少都有涉及，惟不像上舉一篇在題目上明揭敘事為其題旨的。

二、各篇要旨簡介

莊雅仲的兩文講的是荷蘭帝國、滿清帝國對台灣原住民的操控，是帝國為了對被殖民者遂行統治，便營造出一套殖民論述。盧建榮講的是九〇年代原住民還我土地抗爭脈絡下，提出環保論述來對抗漢人政權對其生存空間的剝削。九〇年代的國民黨政權標榜的雖是共和國，但對原住民生存權的剝奪與曩昔帝國幾無兩樣。

緊接帝國與原住民主題之後的是記憶與遺忘的問題。在權勢集團與弱勢群體的對抗當中，雙方都對現實的生存意義連結到歷史記憶上頭。在夏春祥文中，我們看到總統府前短短百公尺的馬路，其路名會由紀念外來統

治者頭頭，轉變成原住民族名；在張瑞德文中，七七抗戰紀念日和光復節這兩個國家慶典所鋪張的文化霸權，在行之有年後抵抗者提出反霸權論述；在廖炳惠文中，百年台灣兩個外來政權所控制的公共文化空間，到了九〇年代遭逢強勁的對抗，各種異議論述這時才蜂擁而出。在張嘉驊文中，更直接寫到被遺忘的歷史需要文學敘述來復原，而復原的多樣性就是多元論述的建構。錯開張文，其他三文都點出權勢集團在經營文化霸權上要依賴文化政策不為功。

第三個主題是敘事文化與歷史書寫的關係。這在張文中只是純從理論層面點到為止，等到了江政寬手上，除了提供後現代史學學術背景，更利用黃仁宇的歷史文本進行細緻的喻解。

第四個主題是女性身體審美觀背後的情慾問題，以及美的呈現需仰賴科學論述以爲助。這方面的問題近來引起各方討論，本書只選了祝平一文，而且該文是一篇只在討論會發表過，尚未正式發表的文章。這是本書讀者的福份。

第五個主題是國族論述，這也是近來熱門問題，本書只選了廖咸浩一文。之所以獨鐘情於廖文，有兩個原因。國族主義的討論，只有給爾納（Ernst Gellner）將它妥善置入資本主義脈絡來討論，而且剖析至微。這樣饒富理論的討論，國人很難領會。而廖咸浩是詮釋給爾納迄今最精到的人。其次，廖文用了兩位女作家小說文本，即李昂的《迷園》和朱天心的〈第凡內早餐〉，這在扣緊理論討論上，用得巧妙。

三、編輯所呈現的書寫共通風格

這些文章在歷史書寫上有一些新風格值得在此提出。首先，這些作者多少都能與西方學術展開對話，已跳出本國學術的淺池，探首海外。在討

論國族認同，廖咸浩找來給爾納與他對話，已如前述。講到殖民主義，夏春祥、莊雅仲、盧建榮、廖咸浩等都乞靈於這方面萬神殿的一衆大師，諸如Frantz Fanon（法南）、E. Said（薩依德）、Homi Bhabha（巴峇）、Stuart Hall（霍爾）、以及Gayatri Spivak（施碧芙）等人。處理到敘事的問題，江政寬和張嘉驊哪敢忽略Hayden White（懷特），江還引進Georg Lukacs（盧卡奇）；此外，莊雅仲也不能不借重講究民族誌書寫的James Clifford（克利弗德）。而講到文化研究，法國的兩位文化理論大師，即Pierre Bourdieu（鮑爾笛）和De Certeau（德薩透），分由廖炳惠和莊雅仲在論文相關處不能不予倚重。至如批判當代文化的前輩學者，諸如Louis Althusser（阿圖塞）、Raymond Williams（威廉斯）、以及Jurgen Habermas（哈伯瑪斯）更是祝平一和廖炳惠於論文相關處不能不引證、並加以討論的。上舉學者都是在今天文化研究領域中爲人津津樂道、或是耳熟能詳的名流，幾乎快要變成常識。由此可見新學傳播之深之廣。至如各學門討論所需專門的重要創獲，更由上述作者多所引述，不必一一指出。

其次，一些術語由生疏變熟稔。基本的兩個語辭，即文本（text）和論述（discourse），固不消說。Said曾說，人文學者不使用以下四辭者幾稀？哪四辭呢？答曰：「再現」（representation）、「人類學（家）」、「土著觀點」、以及「被殖民」等辭。其中，再現一辭幾乎在各文中泛濫成災。還有像符號、符碼、閱聽人、文化商品、場域、挪用（appropriation）、表述（articulation）、共謀（conspiracy）等等不一而是。猶記我一次投稿，由於上述一些用語的使用，便被一位外行審查人認定是中文不通的證據，令我啼笑皆非。

第三，有了來自文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傳播學等盟友學科的共商大計，令歷史學者在文學敘事文化、人類學民族誌寫作、以及其他兩學科講求報導文體等方面受到種種刺激，無形中對敘事史學的提倡不無助

益。這在消極上或可改善史學作品唯事抄資料、弄到文章臃腫不堪的地步而後已的作風。

各位讀者諸君且暫時撇開以上編者的絮聒，趕緊參加這場論述的嘉年華會。本編是否會引領以後歷史研究的趨勢，馴至形成規訓、或是定型化書寫風格，端賴編者、讀者一起努力了。

盧建榮寫於10/31/2001

汐止君士坦丁堡

目 錄

編者序 論述的嘉年華會	盧建榮……vii
帝國與原住民	
再現、改宗與殖民抗爭	莊雅仲……003
裨海紀遊	莊雅仲……041
魯凱人反水庫運動的文化政治意涵	盧建榮……061
記憶與遺忘	
當代公共文化的回顧與展望	廖炳惠……081
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	夏春祥……107
紀念與政治	張瑞德……149
歷史與敘事	
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	江政寬……207
發掘一座城的身世	張嘉驊……237
身體觀與情態論述	
塑身美容、廣告與台灣九〇年代的身體文化	祝平一……259
國族論述	
「只可」哥哥，「害得」弟弟	廖咸浩……297



文化與權力

台灣新文化史

再現、改宗與殖民抗爭

——十七世紀荷蘭統治下台灣的殖民主義與傳教工作

莊雅仲

原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五期，1993年11月

摘要

對於十七世紀荷蘭統治下台灣的殖民主義與傳教工作，雖然研究者不乏其人，不過似乎都忽略了殖民政府、教會與當地土著之間複雜的互動過程，更遑論了解存於殖民情境中有關再現、權力、改宗與抗爭等諸多問題。

本論文試圖分析這一段殖民史中，有關對異己性（otherness）的再現與挪用，與殖民控制與反抗等問題。從甘第爹士（G. Candidius）的報告、尤尼斯（R. Junius）的遠征與土著方言的使用，我們知道不管是殖民或改宗都不只是強迫性的屈服而已，還必是符號或再現的政治學與經濟學；它說明了征服與臣服是透過什麼樣的過程成為可能，以及權力運作的

暴力性和必然面臨的內在矛盾與外在挑戰，這些無可避免地構成有關異己論述的特質。

一、導論：理論、文本與脈絡

對於十七世紀荷蘭在台灣的殖民與傳教事業，雖然研究者不乏其人，不過多仍停留於事件描述與一般歷史背景的介紹；日人中村孝志對這一段殖民史有深入的分析，可惜只偏重於經濟與產業方面^①；注意到殖民政治與傳教之間相互關係的文章，又多只是浮光掠影的討論，沒有辦法照顧到殖民政府、教會與當地文化之間複雜的互動過程（廖漢臣，1953，連溫卿，1955，莊松林，1959，曹永和，1979a）。例如在廖漢臣、連溫卿和莊松林的文章中，雖然教化已是他們討論的主題，不過因為簡單地將殖民主義等同於經濟剝削加宗教教化，因此只注意到表面上土著的屈服，以及殖民者優勢的武力與宗教，無法進一步探討這一段殖民史中複雜的殖民策略與傳教手法。而中村孝志雖然在經濟層面的討論具有其一定的貢獻，但仍然忽略了教化所蘊含的「文化」意涵（1955、1991）。

柯博識（J. J. A. M. Kuipers）的文章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是第一個按照荷蘭改革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在台灣傳教的形式與特質，將這一段殖民脈絡下的傳教事業分成若干時期，雖然他本身對教會抱持著正面的立場，然而他也注意到了教會本身的衝突，以及基督信仰與當地文化的關係。在他的文章中，柯博識根據坎培爾（Campbell）書中（1903）所收錄的檔案紀錄將這一段殖民傳教史分成七個時期^②：（一）草創期（1627-35），（二）綏靖期（1635-36），（三）奠基期（1636-43），（四）轉變—爭議期（1643-47），（五）建立明確傳教形式期（1647-53），（六）成長期（1653-61），（七）結束（1662）。除了某些部分因立場關係可能有待商榷外，這一個分期基

本上照顧到了在台灣的殖民傳教的特色，以及內部性質的轉變。

新近人類學、史學與文學批評對殖民主義的注意，可說提供我們一個比較複雜與批判的觀點來看這段歷史，狄克斯（Nicholas B. Dirks）就指出殖民主義其實與人類學的文化概念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人類學文化概念的發明也許不可缺少殖民主義這個舞台，它一方面需要文化知識（爲了控制與規範），而且一方面也特別提供符合『文化』的殖民區域（1992: 3）。換句話說，人類學作爲一個新興的學科與殖民主義之間乃存有唇齒相依的曖昧關係，因此對任何殖民主義史的研究都將不只是對現象的了解與歷史的偏好，它必然也是學科史的探討及某種特殊的權力與知識關係的考古學^③。李維斯陀（Lévi-Strauss）在1966年談到人類學的過去及未來與殖民主義的關聯時就這麼說道：「假如要當地的文化將人類學視爲一個合法的知識追求，而不是殖民時代或經濟宰制的結果，那人類學就不能只是換換場地而遊戲仍然不變；爲了在那些缺乏歷史記載的文化裡從事研究，人類學本身必須經歷一個深沉的轉變（黑體爲筆者所加）」（1966: 126）。對李維斯陀來說，這個轉變牽涉到乃是傳統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角色的改變，這不只是過往那些被西方學者研究的「對象」開始起來研究自己的文化，同時也是人類學本身特性及眼光的轉變——從一種外在的觀點變成內在的探討。就像克利弗德（James Clifford）所說，這乃是一種新形式的民族誌生產方式：「如今資料會從一個文本移到另一個文本，從記述（inscription）變成轉述（transcription），報導者及研究者都同時是某種文化發明的讀者和作者」（1986: 116）^④。換句話說，殖民或後殖民狀況將民族誌書寫推到了極致——內外觀點的揚棄、主客位置的模糊，民族誌也從此成爲克利弗德所謂多音的寓言。

當然十七世紀台灣的殖民史不會直接關聯到西方人類學學科的確立，然而這一段牽涉到權力、再現、鬥爭與翻譯（包括語言和文化）的過程，

卻至少可以作為一種學科前史的探討，這不僅是對自大發現之後全球性殖民狀況的了解，同時也是細微地去探討一個普遍性的文化接觸及交互翻譯過程的開始：例如柯博識分期中的轉變—爭議期就代表著殖民脈絡下的「文化翻譯」所引起的困境，就如同李維斯陀的反省一樣。其實薩依德（Edward Said）所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可說是此一效應中最引人注目者，雖然薩依德對現代人類學並無太多批評，甚至還相當讚賞像葛茲（Clifford Geertz）這樣的人類學家（Said 1979: 326），不過他將整個東方學視為西方對異族的想像，及建基於權力關係的學院知識體系的說法，仍然在人類學引起極大的震撼，克利弗德在〈論東方主義〉（“On Orientalism”）這篇文章中就提到：「雖然薩依德的文章有時仍然會掉進他自己所攻擊的本質論中，而且常常曖昧地陷入西方人文主義的整體性概念中，不過仍然成功地質疑了一些重要的人類學範疇，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文化的概念」（1988: 271）。它讓我們了解到所謂中立客觀、獨立且界線分明的文化秩序其實僅是一種虛構，是蘊含於西方整個理性、道德與美學的意識形態之中的想像⁵。而洛巴薩（José Rabasa）在一篇研究西班牙對美洲印第安人征服過程的文章中，更明白指出他對征服過程的研究「並非是要將這些事情化約為一般的計畫或企圖，而是要了解征服如何展現出殖民遭遇的形式以及認識上的限制，通常它們都糾纏著民族誌急欲建立的信心」（Rabasa 1987: 133）。

因此這同樣是我們分析十七世紀台灣殖民史的企圖，了解殖民權力、基督信仰和當地文化之間交互詮釋、翻譯、挪用（appropriation）和鬥爭的殖民論述，乃是問題化（problematize）所謂再現過程（process of representation）的起點，及反省建基於二分結構中刻板化策略的開始。在這裡可以發現，殖民論述的分析使得我們注意到這些一般性的差異描述所可能碰到的問題與困境。相較於薩依德在這些問題上所展現出的對立及本